



越文化研究丛书

任桂全 著

绍兴城市史

(先秦至北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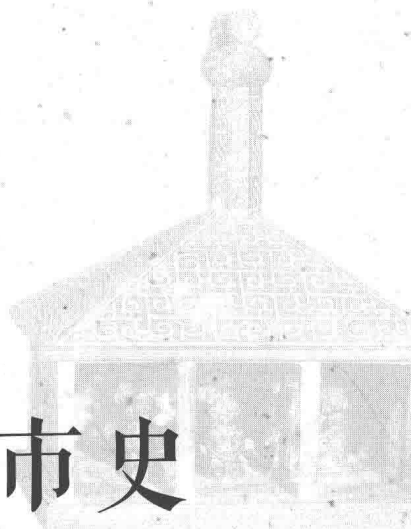


越文化研究丛书

任桂全 著

绍兴城市史

(先秦至北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绍兴城市史. 先秦至北宋卷/任桂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203-0156-5

I. ①绍… II. ①任… III. ①城市史—研究—绍兴—
先秦时代—北宋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45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3.5
插 页 2
字 数 603 千字
定 价 1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基地

项目（16JDGH11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越文化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浙江省哲社重点基地越文化研究中心）

越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安平秋 黄 霖

委 员 王志民 王建华 叶 岗 冯根尧 朱万曙 寿永明
李圣华 张太原 陈书录 周鸿勇 赵敏俐 胡晓明
费君清 高利华 郭英德 徐吉军 钱 明 谢一彪
廖可斌 潘承玉 魏小琳

主 编 寿永明

执行主编 潘承玉

献 给

绍兴建城 2500 周年

(公元前 490 至公元 2010 年)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越国的兴起与越都城的规划建设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都城（前 490—前 221）	47
---------------------------------	----

第一节 越国的兴起	57
-----------------	----

第二节 越都城的地理环境与人口规模	79
-------------------------	----

第三节 越都城的规划建设	105
--------------------	-----

第四节 城市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154
------------------------	-----

第五节 城市文化的创造与累积	181
----------------------	-----

第二章 区域行政中心的形成与城市环境的优化

——秦汉六朝时期的会稽郡（县）城（前 221—581）	209
-----------------------------------	-----

第一节 会稽郡行政中心的形成与治理	221
-------------------------	-----

第二节	人口迁徙与会稽士族的形成	246
第三节	城市环境的调适与功能区建设	286
第四节	城乡经济从萧条、复苏到繁荣	335
第五节	会稽文化创新与地域特色	377
第三章	城市形态演变与东南都会的繁荣	
	——隋唐至北宋时期的越州州城（581—1130）	417
第一节	越州的多层级建置与城市地位	425
第二节	越州的城市人口与社会生活	443
第三节	越州城市的形态变迁与结构优化	502
第四节	越州城乡工商业的发展	594
第五节	越州文化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639
后记		689

绪 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城市，作为世界上近半数人口居住和生活的城市，自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其研究范围涉及众多与城市相关的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环境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文化学、城市美学以及城市史学等。而且通过各方面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不少学科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了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骄人成果。城市史学虽然起步较晚、成果有限，但它同样表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 国内外城市史研究概况

城市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一般认为，城市史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最初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到 60 年代，才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的新兴学科，在美、英、德、法等国发展起来。^①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先是欧、美，后是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地

^① 参见陆伟芳 [英] 里查德·罗杰《英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走向》，《都市文化史：回顾与展望》（《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49 页。

区,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在工业化进程中,伴随出现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新兴城市的出现、老城市的扩建和改造、城市人口的激增,使许多发达国家变成了城市国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城市史学首先在这些城市国家中得到发展。史学家企图通过对城市本身的历史研究,对城市发展、城市文明进步和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做出理性的、科学的解读。^①

然而,由于城市史学出现时间不长,各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一,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城市史研究还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因此就现阶段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理论构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研究的切入点和内容的着重点也不尽一致。对目前世界城市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三种观点或派别。

一是以美国某些城市史学者为代表的城市史观,认为城市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或者说城市史就是社会史。其主张政治、经济、人口、社区、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与地理维度相结合的多角度的总体透视。^②这种综合性的理论构架的优点是便于从宏观上考察城市化的渐进过程。其最大的遗憾是把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史等同起来,使城市史失去了自身的重心而变得缺乏个性。

二是以加拿大一些学者为代表的城市史观,认为城市史学的重点应该是经济史,因为城市化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发展过程,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推动或制约着城市化的进程。^③以经济史作为城市史研究的重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加拿大城市发展的基本特征,如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但如果放到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或许缺少它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当经济史在城市发展史中的地位被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时,对

① 参见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城市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4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城市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将会变得软弱无力。

三是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城市史观，把城市本身的发展作为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将城市史划分为若干历史发展阶段进行详尽考察，并将环境、人口、政治、经济、文化、休闲等与城市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而揭示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注重城市类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派别，如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兰帕德把城市看成一个“生态复合体”，主张从多方面研究“城市化过程”^①。法国历史学家把城市看成一种社会结构，主张在总体史观观照下，依靠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和建筑师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共同合作，对社会结构的整个运转过程进行研究。^②

尽管国外城市史研究者的观点、派别甚至理论构架不同，研究视角、切入重点和采用方法也不尽一致，但都各有特色，出现了不少代表性作品。如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和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重要著作之一《城市发展史》，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综合地研究了城市发展史，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城市发展与文明进步、文化更新换代的联系规律”^③。另外，如美国乔尔·科特金编著的《全球城市史》、英国克拉克等合著的《剑桥英国城市史》和美国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在城市史研究领域里的创造性贡献，同样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

相对而言，我国城市史研究起步更晚一些，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有一些有志于此的学者涉足该学科领域。让人欣慰的是，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从城市史学理论研究、城市史编著，到城市史研究方法探讨，不仅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多有独到见

① 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城市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48页。

② 同上。

③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文第一版译者序言》，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解，而且从一开始就进行跨学科研究，百花齐放，各抒己见，取得了不少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为推动我国城市史研究和加强城市史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城市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虽然至今还未见有系统的理论构架和专著问世，但相关的专题研究或学术研讨会，则时有闻见。由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合编出版的《城市史研究》年刊，从1989年创刊至2007年已累计出版24辑。其中不少论文，针对城市史的定义、对象、范围、内涵、主线（或主题）以及研究路径、方法等问题，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开展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富有见地的意见和主张。

如皮明庥、李怀军《城市史的思路与视野》一文认为，城市史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与国别史、流域史、地区史不同，其研究的焦点在于城市本身，主张城市史应“着重于对城市兴衰历史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全方位的研究，其陈述性和论述性不仅有机地结合，而且采用多学科的广角思维”^①。

隗瀛涛、谢放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总是具有不同的城市结构（包括城市的地域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生态结构等），而不同的结构又决定了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城市各种功能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城市结构的变化。因此，主张近代城市史应以揭示城市结构、功能发展演变及其近代化的历史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这样既有利于揭示近代城市发展规律、体现城市史自身特色，也可以直接为当代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历史依据。^②

也有一些研究者从近代城市史的视角，赞同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认为研究城市史就是研究城市化的演进过程。此外，针对把城市史等同社会史的观点，有学者明确认为，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说，城市史与社会史是

^① 皮明庥、李怀军：《城市史的思路与视野》，《城市史研究》第5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② 参见隗瀛涛、谢放《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城市史研究》第3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平行的两门学科，虽然研究的范围同样大，但是它们的研究角度各有侧重。^①

至于城市史研究方法，有的主张重视吸收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城市历史为线索，追溯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有的强调运用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城市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城市人口、社区、市民心理、行为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历史变迁。^② 有的把城市看作一个结构、一个系统、一个动态的主体社会，主张运用各种与城市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整个城市社会、城市文明及其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③

我国学者在城市史学理论研究取得成果的同时，在城市史编修方面也有不小的收获。虽然到目前为止，数量并不算多，但就面的拓展来说，却是全方位的。从城市总体史、区域城市史、城市类型史、断代城市史、城市专题史到城市个体史等，几乎无所不及，应有尽有。

城市总体史研究成果，属于通史类的，就有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戴均良的《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虞和平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曹洪涛、刘金声的《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等。何著《中国城市史纲》，是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至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著作，“带有填补中国城市通史研究空白的意义”^④。

区域城市史研究成果包括按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组成的区域性城市群研究成果。前者以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为代表，通过运河这条纽带，突破行政区划界线，将分布于两岸的

① 参见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城市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48页。

② 参任云兰《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城市史研究》第6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③ 参见皮明麻、李怀军《城市史的思路与视野》，《城市史研究》第5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④ 定宜庄：《有关近年中国明清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城市群联系起来加以总体考察，以探究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的城市发展规律。而《河北城市发展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堪称后者的代表，其最大特点是通过由直辖市、省会城市、地区中心城市和县城构成的行政层次系统，来考察具有我国城市特色的区域城市系统及其规律。此外，由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同样属于区域性研究成果。

而所谓城市类型史，其实就是按照城市的不同类型——如古都类、经济类、矿山类、港口类等，进行分类组合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虽然这方面成果不多，但是影响不小，有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和《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这些古都都可以认为是我国传统城市的精华所在，参与研究的又都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领域里的著名学者，该成果的发表，不仅推动了我国古都学的研究，也为我国城市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古都史研究填补了空白。

与城市类型史不同，城市专题史研究则相对活跃，成果也不少。比较有影响的有：张继海的《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任重、陈仪的《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程存洁的《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湖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刘凤云的《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孙健主编的《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等，涉及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史以及城市管理各个方面，对于把城市史研究引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近20年来，我国城市史研究重点和所获成果，多集中在近代史方面。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七五”期间，规划小组就将上海、武汉、重庆、天津等四个不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列为重点研究课题，由相关历史研究者承担了本地近代城市史编写任务，以后又相继在成都、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举办了有关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接着，由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皮明床等著《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谢本书等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等，便先后问世。这些近代史，既是城市断代史，又是城市个体史，可以认为是我国城市史研究初始阶段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在城市史研究的初始阶段，把近代史列为重点，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与古代城市相比，它更贴近当代、贴近现实，更有利于为目前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城市化提供服务。但是纵观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仍有不少薄弱环节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尤其要加强对以下三类历史城市的研究：一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无论是一统国家还是诸侯的都城），这些都城在特定时期内，都居于最高行政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作用举足轻重，是城市的精华所在；二是处在首都、省会、府（州）、县等行政层次体系中的行政中心城市^①，其兴起、发展乃至衰落，几乎无不受制于各种行政因素；三是某些历史特别悠久的城市，历数千年而城址不变，而且既不增大又不缩小，使城市的规模大小与城市的稳定性之间，达成了超乎想象的密切。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历史城市至今还研究不多，更没有相关的个体史问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上三类历史城市代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特别是那些行政中心城市，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占了绝大多数。它们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由经济而发展为城市的道路不同，是由行政而发展为城市，其特点则表现为，首先是行政中心，然后才是经济中心、

① 冯承柏先生在《城市发展的比较观》一文中提出：“首都、省会、府（州）、县构成了中国城市的行政层次体系。这个层次分明的行政体系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保证帝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还发挥着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镇压内部叛乱，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城市史研究》第8辑，天津教育出版社，第9页）笔者因此认为，中国的传统城市数千年来在“行政层次体系”条件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体系，这就是不同于“区域城市体系”的“行政层次城市体系”。

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深入探讨中国传统城市特别是行政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及其轨迹,不仅会大大丰富城市史研究的成果,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可能会因此找到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模式和路径。

二 绍兴城市史研究的意义

与上述三类历史城市相对照,绍兴可谓是三者兼备、内涵特别丰富的历史城市。它既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国都城,又是从秦汉以来到现在的区域行政中心,而且还是2500年城址不变的历史城市,在当代又是全国第一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虽然在我国现有城市中,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有38个^①,有县级及县级以上城市661个,还有县域行政中心1470个,但其中既是古都又是区域行政中心,既是先秦城市又是至今城址不变的城市,恐怕就屈指可数了,而绍兴正是屈指可数者之一。这在我国传统城市中是个奇迹,从城市史个案研究角度看,有其独特的典型意义。特别是绍兴古城作为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城市实例,在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城市功能的行政性、城市规模的稳定性和城市文化的连绵性等方面更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价值。

(一) 一座按周代礼制规划建设越国都城

在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大抵不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一开始就按严格的规划兴建,以后便沿着这个基础向前发展,如绍兴就是;另一种是开始时并无统一规划,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重新规划,上海也许属于这一类。前者的优点当然是城市定性明确、功能齐全、布局比较合理,遗憾的是,后来城市的发展容易受到束缚,难有突破,趋向保守。后者在开始时可能出现无序状态,但反而给后来的发展留有很大空间,特别是一旦进入规划程序后,有序发展将势不可当。

^① 参见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绍兴城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前490），时值勾践在吴国经受三年凌辱后回国之初。^①原来的越国古都，从无余立国到勾践即位，千余年间，长期居于会稽山腹地之中。勾践深知，要使越南强大起来，实现报仇雪耻、称霸中原的目标，必须把都城从封闭的会稽山区迁到开阔的山会平原上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都是国家的象征，国都稳固、安全与否，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所以越王勾践回国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国立城”（《吴越春秋校注》卷八《勾践归国外传》），把都城建设当作振奋民心、团结国人的标志性重大工程来实施。可见，勾践对城市建设的性质定位，是十分清楚的，他不仅要建一国之都，而且还把建都与强国方略、称霸宗旨紧密结合起来，这在先秦城市建设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根据城市的性质定位，范蠡受越王勾践嘱托，在城市选址上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措施。明确提出：“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吴越春秋校注》卷八《勾践归国外传》）在综合考虑城址的地形地貌、环境条件、资源配置和防灾御敌等诸多因素之外，特别强调了地势的平坦广袤和对外的四通八达。这其实就是现代城市地理学中所谓的城市区位问题，城址如若占有区位优势，那么对于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对于城市未来的发展与扩张，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范蠡按照上述选址思想，最终选择今绍兴古城所在地为越都城城址。这里地处会稽山北麓、钱塘江南岸，地势由南向北倾斜；东西两翼，又分别以东小江（曹娥江）和西小江（浦阳江）为屏障。依靠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在东西约八里、南北约七里的范围内，依托由会稽山脉没入山会平原后崛起的种山（76米，高程，下同）、戴山（52米）和怪山（32米）等大小九座孤丘为城址，建立起越国都城。此后绍兴城市发展的实践表明，范蠡的选址思想是富有远见的，突出表现为：一是城内有山有水，为后来绍兴山水城市及水乡风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① 参见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八《勾践归国外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06—212页。

二是都城四周平坦广袤，给绍兴城市预留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以九座孤丘为城基，地质条件稳固安全，而且南来的河湖水系既可利用又能避灾，得使 2500 年城址不变，赓续相继。

在越都城建设中，如何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满足当地的人文需求，以实现天、地、人和谐相处，是范蠡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他接受建城任务之后，便马上“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并且以“象天法地”（《吴越春秋校注》卷八《勾践归国外传》）即效法天地、遵循规律为越都城规划的基本理念，把都城建设分两步走。先以种山为依托，筑作“勾践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为两螭绕栋，以象龙角。东南伏漏石窠，以象地户。陵（陆）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以示服吴”（《吴越春秋校注》卷八《勾践归国外传》）。这里所谓的“天门”“地户”“龙角”“陆门”“八风”都是天上地下的对应物，目的是想通过把地上的建筑布局与想象中的天上布局相对应，把人间的建筑秩序模拟成天上的建筑秩序，以反映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感性对应关系，这是古人“天人合一”宇宙观在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反映。

紧接着范蠡又在勾践小城以东建“山阴大城”。据《越绝书》记载，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设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山阴大城与勾践小城在空间布局和功能配置上，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坚持“坐西朝东为尊”^①的周代礼制。小城是越王勾践的“宫台”所在，具有“城”的性质，大城则承担了都城的其他功能，起到了“郭”的作用，所以《吴越春秋》卷八称为“外郭”。在空间布局上，小城在西，大城在东，这种西城东郭、城郭相连的空间结构，就是“坐西朝东为尊”的周代礼制在都城建设中的实际运用。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

^① 杨宽先生在对大量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古代都城的基本结构为：a 由小城和大城两部分组成；b 东汉以前实行“坐西朝东为尊”礼制，以后转变为“坐北朝南”。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